

# 对一个城市社区的利益群体的剖析

——兼论如何具体认识社会的利益关系与矛盾

于 真

笔者于1989年3—4月参加为期近40天某市市情调查,通过全面搜集建国以来历史与现实、静态与动态资料,并进行千人问卷调查、百人走访等方法,对该市各利益群体状况作了比较细致的调查,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初步理清了一个城市社区的各群体的复杂的利益关系,以相对独立的社会利益单元——利益群体作为考察对象和逻辑起点,具体地剖析它们的现实状况、利益关系和矛盾。

## 一、基本利益关系概述

我们调查的是一座轻纺工业发达、拥有30万人口、临江的美丽而文明被誉为明珠的城市,1981年该市被国家定为综合体制改革第一个试点城市,许多工作走在内地城市的前列。1988年社会总产值达306164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全市人平产值1万元,日产值1017万元。全部职工167052人(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月平均工资135.58元。从城区居民生活质量来看,在“富”(人平均月生活费收入达93.06元)“安”(安居乐业,劳动就业率达99.8%)“能”(智能发展,科技专业人员占全市人口7.12%,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21%,文盲、半文盲占11.74%,只为全国此数的一半)“乐”(近40%的人对业余生活感到满意)“美”(有71.2%的人对优美的城市环境感到满意,城市绿化面积人平均 $3.4M^2$ )五个方面的人均具体指标(这是标志社会发展最过硬的指标)考察,职工小康生活已经在望,青年人的全面发展略见端倪,但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综合研究社区的利益结构,对认识社会中的利益关系与矛盾会有许多现实意义。

作为一个完整的城市社区,该市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即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经济的巨大发展所带来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满足;有着共同的愿望,把这个城市建设成全国性的明星城市;有着共同的心理,即作为城市一员的自豪,他们有为能在国家投资不多的条件下贡献不少而感到光荣的社区意识(40年来财政上缴是国家拨款的7倍)。社区的内聚力和吸引力是很强的,到这个城市工作的不再想调出,即使是数日短暂的停留,也会为这座城市的清洁、美丽、舒适所吸引。它欣欣向荣,是个很有特色的典型城市社区。但在这个有共同利益、共同心理、共同的社区意识的“一般”状况下,仔细考察生活在这里的不同群体的“特殊”状况,就能达到既认识社区利益同一性的一面,又认识其矛盾性的一面,才会把利益关系弄清楚。

这个不带县的市,总面积166平方公里,城区面积29.4平方公里,城区人口为256142人,郊区人口为53828人,有四乡二场(农场),远郊农村具有农村社区的特点。近郊以蔬菜为

主，远郊则以稻棉为主。前面所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水平，主要是指城区。实际上，农村人均收入仅及城区人均收入的1/3到1/2。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城里人和乡下人是两种不同的身份，具有不同的利益地位和现实心态。

与城乡居住地和社会分工相联系的差异是工农差别，该市全民、集体职工总数167062人，农民13600人，工农之比为12.28:1；农业生产除1400亩机耕面积外，几乎全部是手工操作。在这种条件下农民担负着市区25万居民的蔬菜、鲜鱼、蛋、和部分粮食及肉类的供应，劳动是艰辛的。多数农民还是希望其子女进城当工人，两大友好阶级的生产与生活有明显的差别。

在劳动性质上，体力劳动的操作工和农民与从事脑力劳动的各类人员，其比例为7:1，体力劳动者158096人，脑力劳动者22556人。脑力劳动者工作条件优越，一部分进入管理层，基本上可以不干体力活。脑力劳动者从一批批的学生中不断递增，体力劳动者逐渐地在相对减少，这种趋势可从以下数据看出：从1949年到1988年脑力劳动者增加了32.3倍，1978年后10年体脑比例由1:0.095缩小到1:0.156。该市由于就业率高达99.8%，所以城市的繁重的体力劳动除部分地转给本市农民外，一大部分转到外来的农民工身上。邻县邻省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进入该市，计划外用工即达19360人。因此，体脑比例实际还要大一些。

与劳动性质相联系，具有政治经历、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的管理干部与被管理的广大群众之间存在着人、财、物管理权力的有无，身份的不同和职业方面的差别。该市管理人员为8807人（不包括专业技术干部），占职工总数的5.27%、劳动人口的4.82%，干群之比为1:20.37。

与所有制相联系是国营经济与城乡私营经济的分野，该市从事个体私营经济的人数是9245人，公私人数量比为18.07:1。公有经济，尤其是在工业方面占有压倒优势和毋庸置疑的主导地位。在公有经济领域，又有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区别，全民所有制是计划经济的支柱，它受国家保护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计划与管理体制的制约；集体经济相对地主动权较大，该市集体经济十分发达，有些全民企业是集体企业升级或“母鸡下蛋”形成的。全民与集体职工之比为2.31:1，而独立核算工业总产值却超过1/2（1988年全民为16.1亿，集体为9.4亿）。收入水平：全民年平均工资1700.3元，集体年平均工资1462.1元。全民集体的收入都视经营情况而定，但一般全民有的福利、补贴集体也都有，干部在集体之间可以调动，限制得很死的是集体制工人不能提干。

在城乡私营经济中，还有私人雇工，虽然多属亲戚、朋友、本村人，但他们和雇主之间有着劳资关系的差别。

这六种——城乡、工农、体脑、干群、公私、劳资——关系构成该市的基本利益关系，表现为经济、政治、职业、知识、社会身份等地位的不同，也决定着该市人民内部具体利益的不同，形成了以利益差别为基础、以职业身份为标志、以权力与财产为内核的许多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它是分析社会利益结构的基本单元，如同化学中的分子一样，虽然它还有内部的结构层次，但它的性质和作用却是一样的。我们称之为社会利益群体，是因为这种群体凝聚着在社会经济的整体运行和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客观存在的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几个人或极少数人的不构成社会性的利益，它也区别于性别、年龄、种族、民族等较大的以及小集团、宗族、家族等较小的那种有其特殊利益的群体，是与生产力紧密联系、以社会分工为

前提、相互依存反映一定生产与分配关系的利益群体。

## 二、利益群体的现状

在该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条件下，可根据上述六个方面的不同，将全市人口划分为城市工人、城市农民工、专业知识分子、管理干部、企业家、业主（个体户）、农民、农民专业户、宗教职业者九个职业群体和待（无）业者、游民、反社会群体三个非职业群体。下面就分述各群体的现实状况。

1. 城市工人。构成该市劳动人口的主体是城市工人，他们从事物质生产和商业、服务业等第二、三产业。其中全民所有制产业工人与现代生产手段结合，人均年创财富14553元，实际所得为年人均1700元（包括企业中的管理干部与专业技术人员），假如他们负担的管理干部的不直接进行物质财富的创造能和近几年企业的各种物质奖励和超出工资总额的实惠可以大致持平的话，则一线工人贡献了他们劳动价值的87.84%，这是产业工人的光荣和对社会义务的承担。

城市工人内部可分为三个层次。

① 正式工。即在编的全民与集体所有制的固定工人，他们政治上有领导阶级——国家主人翁的地位，也被称为企业的主人，经济生活上收入有保障，有各种劳保福利。该市集体所有制工人的贡献甚至超过全民，人年均创造财富达19036元，但其人年均收入为1462元，贡献了价值的92.32%。无论是全民或集体，具体的行业和企业效益决定着浮级工资和奖金，全民与集体的收入有差异，但利益地位则是相同的。1988年该市全民所有制的工人数为93998人，集体所有制人数为50498人，共144496人。

② 城市户口合同工。这种工人有两种，一种是上述正式工中实行承包合同的合同制工人，他们的收入直接与完成承担生产任务的好坏挂钩，以避免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弊病。在那些产品畅销、任务饱满的企业中，这种工人效益显著；相反，由于执行合同的条件欠缺或因市场疲软不能实现企业利润时，这类工人就会受到损失。因为决策失误、管理不善所带来的损失转嫁在工人身上，往往会引起工人的不满。另一种是1986年国家不再招收固定工后进厂的新工人，他们具有体力上、文化上的优势。这两种工人在生活待遇上的区别是不大的，只是在需要较强体力的工活中，前种老工人就要稍逊一筹，多少带来师徒之间的心理不平衡。合同制工人的人数为15947人。

③ 城市户口临时工。该市城区就业率高，当年成长的劳动力当年都能得到安排或干个体，临时工队伍很小，1988年底只240人。他们仅只是处于一个过渡阶段，也就是等指标或做某种选择的阶段。这与1978年前为谋求温饱而当临时工是很不相同的。

除临时工外，城市工人是物质生产的主力军和骨干，其中技术工人尤为重要，他们不仅操作机器工具，而且有许多创造与革新，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该市具体情况下，这三类是一个利益群体，这个群体是工人阶级的基础部分。

2. 城市农民工。一般称作外协工或民工，也有三种形式。

① 轮换工。该市纺织企业多，上三班的倒班女工在城市招不到，便在外地农村招收合同期为三年的青年女工。她们的收入稍低于城市工人，生活条件则与正式工相差甚远，其昼夜辛劳是纺织工中最甚者。约为3000人。

② 外协工。外地来与该市企事业单位签订承包合同的建筑队、搬运队、运输队中的工人，他们能来城市做工，全赖其承包头和苦干。工头与工人的关系，除原来系建制单位外与老板雇工无异。这些包工头是真正的富户，而工人却是艰苦劳动的承担者。还有些三三两两为各单位做些维修、清洁、杂活等的，合计有19302人。

③ 私人雇工。在私营企业、业主店中、家庭中雇佣的农民约700人，除家务工外，收入可观。

这三种人是一个群体，共计23000人。他们身份是农民，实际工作是工人，吃的是高价粮油，干的是苦、累、脏的活。例如一个厂的翻砂车间38人全是农民工。同在一个工厂，外协工干，正式工看。农民工心理上觉得低城市工人一等，很受压抑。但比起农村老家（近则邻县，远则川湘），毕竟一月能多挣几十、上百元不等。由这两万多人的群体构成该市简单体力劳动的底层。一幢幢漂亮的公用大楼、生活住宅浸渍着他们的汗水，其所作出的贡献是一般统计表上找不到的。

3. 专业知识分子。如果说上面的两个工人群体构成生产力的体力劳动部分，那末，专业知识分子群体则构成生产力的智力劳动部分。尽管他们具有干部身份，但与管理干部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是直接从事精神产品的生产或知识传递劳动，工作的依托是自己的智能，而不是外在赋予的管理权力。

该市有专业知识分子16839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6944人，教师3454人，医护3556人，文体界2884人。专业知识分子分高中初三个档次，高级750人，中级4650人，初级5500人，未评及其它情形5939人。另有尚不在干部编制的4995人，是专业知识分子的后备力量。该市能建成一个以纺织工业为主兼有家电、化工、机械、电子等门类比较齐全并有不断更新改进的拳头产品行销国内外的轻纺工业城市并使全市人民文化科学知识得以不断提高，这与专业知识分子的劳动是分不开的。智力劳动在发展生产力上的作用，在这个城市普遍地能感受到。该市许多企业都把设计、产品更新的智力劳动作为“第一车间”，它决定着最终产品的成败。这是该市经济发展、商品有竞争能力的关键。“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学习科学、培养人才”是社区内极为宝贵的风气，他们是通过智力劳动的现实效益体会到这一点的，因此工程技术人员在工作生活上能得到较好的安排。该市体脑工资倒挂主要表现在经费短缺的事业单位，如教育、文化、卫生等单位比较突出。

4. 管理干部。以管理为其主要社会功能的党、政、军、企事业的干部群体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特殊的群体，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层。其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个群体决定着其它群体利益的实现和城市发展的命运，对其他群体具有支配性和示范性。其特殊性是它具有两重性，他们是上级政策的执行者，又是本地区、本单位的章法制订者。一方面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代表，一方面它又有其本身的利益，这是与其它群体只有本身的利益不同的地方。

市管的干部可分为三个层次，市级领导干部32人，其中市委常委9人是领导核心，县局级干部333人，是职能部门和企事业的领导层，科以下一般干部为5712人（该市在统计上将行政机关的副科级以上计入领导干部），其中机关干部3067人。管理干部共计6077人，是建国时262名干部的23.19倍（同期该市人口增加为15.15倍），占全市人口的1.96%。

干部来源 该市早期的干部来自50年代南下与转业的干部以及由本市店员、工人中提拔起来的干部，这些人构成该市第一批老干部。店员出身干部具有经营和文化方面的优势，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一些局级干部就是他们。构成干部中层的多为本地和部队历年转业下来

的干部。因为地方小，又缺乏地区间干部流动，二三十年久留一地，形成稳定结构。干部之间，门当户对的子女联姻十分自然，第二代人上去的机会也就多起来。1984年工转干吸收录用的1743名干部，很大一部分是他们和其亲友的子女，于是民谣“亲家局，夫妻科，外甥倒酒舅舅喝（公宴上），孙子开车爷爷坐（指司机是好工种）”。干部的这种近亲繁殖，无论对政令执行、行政监督，还是对人才的培养使用都颇有影响。

工资与收入 在工人所占比重不多的党政群团的行业分类中，月平均工资为135.58元，在11类行业中占第五位。有效益的企业干部则遥遥领先，街道干部工资最低，还在80—90元之间。

这个群体的特征是它的等级性，层层必须听命于上面，否则，很难保持其自身的存在和地位。当路线正确、政策能协调群体利益时，日子好过，否则也不好过。该市干部在处理国家和地方的利益关系时，总是以大局为重，多贡献给国家，以牺牲小局顾大局的精神赢得称赞与政绩。因为城市不大，干部的言行举止市民都是清楚的。对给城市发展、经济振兴做出正确决策的领导干部和办事勤恳的执行干部，市民给予很高评价；而对少数决策失误、办事不公的干部也是心中有数，只不过不说而已，他们说“说了也是白说”。

5. 企业家。在掌管企业的干部和改革后上来的承包者中，逐步出现一些企业家，虽然他们并不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独立生产经营者，但究竟有别于干部，他们是企业法人，要对企业负全部责任。他们的权威不是靠上面给的“权”，而是靠自己经营企业的“能”，他们是公有经济的当家人。

促使该市经济大发展的30个拳头产品企业的厂长经理，受到各企业职工的普遍赞扬。可也有的承包经营者却是包一年，捞一年，严重的短期行为、变公为私、借包营私使一些人担心会出现一个名为集体、实为私有的承包头经济。这种承包、租赁，如果缺乏严格而科学的责权利标准和有效监督，其弊将大于利。

该市有的企业已开始做股份制的尝试，让职工参股，是否能成为集体与私人所有相结合的新形式，则要看今后的发展。

三资企业在该市只有四家，厂内有经理、职员、固定工、农民工四个利益层次。效益较好，人均月收入为141元。

该市有私人企业8家，其中最大的是有从业人员50人的装璜工程机械厂，其它均属10人以下、注册资金1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如同业主群体一般，不多叙述。

这四种企业家中，国营企业家是主体。

以上群体中除农民工和私营经济的企业家外，统称为工人阶级中的职工，下面是工人阶级之外的群体。

6. 业主（个体户）。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该市个体户才6家，十年间发展到3706家，平均每年以370户的速度递增，从业人员达到5169人，占社会劳动者的2.8%。到1988年底，有财产万元以上户2000个，10万元以上60个，10户已过百万元，最少的月收入也在600元以上。

人员构成 1988年调查1800户，待业青年600多人，职工家属有一方在农村的半边户300多人，留职停薪200人，两劳人员200多人，开除人员100多人，退职人员80多人，城市闲散人员（老年居多）70多人，外地来的200余人。

年龄结构 25岁以下占25%，最小17岁，26—35岁占45%，36—45岁占20%，45岁以上

占10%。

文化程度 1987年只几个中专生,1988年高中比例增大,约1/10,其他均为初中以下。

由于长期以来,饮食、服装、布匹、小商品不能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使个体商业在实行“开放搞活”的政策后得到蓬勃发展,加之为打消顾虑采取低税、定额包税的办法,税轻利大,加上一些偷漏税、行贿与公营工商业拉关系等各种手段,一时财源滚滚,使许多原来的困难户一变而为暴发户,人们为之侧目。虽然其社会地位不高,至今该市还有人不屑为之,但从这次千人调查中,其职业评价竟排在21个职业中第10位。个体户是经济改革最受实惠的群体,它的存在与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是广泛的。首先是对公营经济职工的影响,退职和停薪留职的人数增多,没有去直接从事这方面经营活动的人也想方设法让老小办个营业证,然后业余参加这些活动。有的效益差的企业的个别工人甚至愿意厂里开除,以便去领营业证做生意。至于原来政治文化素质都差的富户,更是挥金如土、吃喝嫖赌,对社会风气带来不利的影响,更让其他群体的市民担心和愤慨。

尽管如此,个体户的存在,对该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仍起到积极的作用:①扩大了就业门路;②方便了生活,个体户占饮食业的79%,理发业的79.7%,修理业的全部;③搞活了城乡经济,货畅其流,应有尽有。到1988年底,商品零售额达8662万元,占全市12.6%,起到了对国营商业、服务业不可缺少的补充作用和一定的促进作用。

由于这个群体思想文化素质不高,所以绝大部分人进行经营的唯一目的是大把赚、大把花,很少有什么发展实业、投资工业的意向,他们活动的主要领域是商业。

如今个体户也面临许多实际问题,如场地、收费、税收和白吃白拿白要等问题,来自城环委、工商、公安、卫生、居委会等部门的各种费用及资助捐赠使之应接不暇,而且标准不一,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开支之大数倍于税。

个体户的心态复杂,发了财怕保不住,就是那修了十几万元住宅的大户也抱着“有一天要交就交,还做我的工去”的念头。一遇风吹草动,就惶恐不安。他们怕的是划阶级、政策变、加重税收、增加摊派。

该市的个体手工业者和小摊贩实际上已全进入个体户的行列,统计上也是包括在内的,不另作介绍。

7. 农民。有三种类型:一是原在国营农场的工人及不拿工资的农民,农场分田承包后如同农民一般,多是菜农;二是以水稻棉花的种植为主的远郊农民;三是正向工商转化的兼业农民。

菜农承包着市区蔬菜的供应,订有供销合同,收入较稳定。但遇到的问题是旺季不管、淡季压价;送菜到集贸市场,菜贩子坐在棚内,菜农在棚外,日晒雨淋;卖点产量少、上市早的鲜菜,市工商局聘的市场协管员拿口袋装。这一类年收入人均900元左右。

远郊农民中棉农收入较好,种水稻收入最差。以该市某村为例:该村162户828人,242个劳动力,570亩水田,人均6.88分地,把种一亩水稻的收益与负担分列如下可观其收益。

收益 早稻产800斤,晚稻产700斤,共1500斤。留口粮800斤,交公粮200斤,每斤0.18元,得36元;售余粮500斤,每斤0.32元,得160元。共196元。

支出 ①每亩两季施肥40斤,中价每斤0.5元,计20元;②农药15元;③良种32元;④育秧薄膜17元;⑤公共抽水费30元;⑥小田抽水费14元。投入成本费高达128元。加上⑦村提留25元;⑧乡统筹、民兵集训、治安费摊到每亩5元。总计158元。耕作终年,仅得口粮,

所余38元,这便是水稻农民的现状。由于田少人多,该村70%劳力向建筑、木工、做小生意转移,即使最无门路手艺的人,农闲也到该市打零工。农业收入仅占该村5.7%而已。全村收入情况:万元以上三户(一个包工头、一个运输户、一个村干部)均建有新楼房,5000元左右8户,1000—1500元30户,500—1000元90户,200—500元33户,不足200元1户。

该市郊区农民正向兼业户发展,种粮只为获得口粮而已,粮食商品率很低,水稻专业户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8. 农民专业户。四个乡共97家专业户,渔业32家,最多;种植业4家,最少。如一家蔬菜专业户与运输户联营,向武汉市送菜,8个人一年收入11.4万元,平均每人1.4万元,现在采用大面积温室种植,他们对农业科技很有兴趣。

另一类专业户是乡村工商户,小工业户11户,商业、饮食服务业18户,集中在交通要道,规模不大,但赢利颇丰。四个乡年毛收入364万元,从业人员68人,以全家4人计算,人均收入也近万,高出农民10倍。流通领域获利之丰,可见一斑。

这些专业户的雇工很少,总共才65个人,多半是亲友子女或招收的徒弟,分配不苛刻,雇工问题并不突出。

9. 与世俗社会利益群体不同的是宗教职业者,目前只有39人。那些经过几十年“改造”并未放弃其宗教信仰者,在恢复宗教政策后,以从事宗教职业为终生之幸。他们联系千余教徒,警恶劝善,精神有所寄托。

以上9个利益群体是有职业分工的。下面3个是无职业但仍有其特殊利益的群体。

10. 待(无)业者。1988年劳动局在册的待业失业人员是2603人,其中年龄在25岁以下的2289人,25—60岁的314人;文化程度为小学的887人,初中1188人,高中528人。到调查时,他们大多去干了个体户,只有400余人是因选工种继续待业。但新近因工厂实行优化组合,“厂内待业”者为数不少。加之微利亏损,滞销产品企业中半失业状态的工人日益增多。如何安排这部分人,是深化改革中的一个难题。

11. 游民。这是指该市自生或流入该市的迷信职业者、卖淫者、流氓、乞丐和其他流落街头者。目前从事算命看相迷信活动的约100人。1987年查获卖淫妇女130名,1988年进行此类丑恶活动者不少于200人。该市每年要遣送1240人次的流浪乞讨人员出市,有的去而复返,其中从事偷盗活动的就占63%,加上本市偷盗者,计约800人左右,构成该市社会财产安全的严重威胁。这个群体的危害是社区急待治理的一大社会问题。

12. 反社会利益群体。该市有在押人犯150名,除盗窃惯犯外,其余是刑事犯罪分子。1984—1988年,每年人犯在150—200名之间,法院年均判处179.6人。他们的反社会行为决定了这个群体的反社会主义性质,专政对于他们具有直接的意义。

还需要介绍的是一些群体的延长部分和后续部分,即离退休职工和青年学生群。该市共有离退休干部、工人20953人,其中离休511人,退休19997人;部队及外地来定居的离退休人员有445人。这些人与原来所属群体休戚相关,利害与共。国家为离休老干部建有堂皇的活动中心,现任干部是他们的后辈、学生、老部下,常来探望与请教。一般而言,老干部生活优裕、精神愉快,间或有因根基不牢失权失势,则牢骚颇多,持今不如昔观点。一般干部与工人退休者或干活挣钱,或择有兴趣的事做,以娱晚年,女性老人以操持家务、带孙子居多。如年老有病,家庭不睦则盼进福利院。全赋闲、养病的只有1/3。

该市有大中学生48143人,大学生2800人,各依其父母所属群体,学生中层次愈高,对

社会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定的愈多，这是个值得严密注意的倾向。

### 三、利益群体的群体意识

以上描述了各利益群体的现状，由于各群体对生产、生活资料支配权和所有权不同，政治地位不同，社会分工的角色和作用不同，获得利益的途径、方法不同，社会需要的层次也不同；又由于同一群体长期地生活于同一利益地位与环境中，“存在决定意识”，就形成各自的群体意识，这种基于实际生活体验的群体意识明显地超出了阶级斗争时期的阶级意识。改革开放以后，各群体在接受自世界各地各国输入的各种观念时也因利益地位、知识状况、信息渠道不同而有所差异，形成目前各群体的意识。

1. 工人 作为城市工人的共同意识是物质利益意识和平等意识，劳动的艰苦与生活的需求使工人首先关注的是劳动能否得到相应的报酬，只要在分配上使工人满意，他们就基本上能得到满足。部分先进工人，尤其是50年代的老工人具有一定的主人翁感，这种主人翁感来自于在旧社会的痛苦经历，和过去比他们感到满足。工人使用机器进行集体生产，产品是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可以单干出来的，财富不能为某个人、几个人可得而私的，因而工人具有强烈的平等观念。在正式工中这种平等观念被过去“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和“大锅饭”体制强化为平均主义，他们对本单位利益分配如奖金、住房都非常敏感，对企业利益有较深关切，有一定的管理参与意识，尤其是有工会组织的单位更为明显；而当搞活经济后其它群体生活改善并超过他们时，就感到“领导阶级”、“老大哥”、“主人翁”并无实质性意义。

合同工则不同，他们要求的正是合同利益的实现，不太关心其它事情。平等意识较弱，参与意识更弱。

外协农民工更不同，非工人身份和受雇佣地位决定着雇佣思想，他们和农民一样，关切的是收入和远在农村的家。

一般地说，工人的集体观念、纪律观念仍然是比较强的。

2. 企业家 与正式工的群体意识截然相反，商品、竞争、自主意识和非平等意识比较强烈，尤其是需承担风险的企业家，有效管理和时间观念都是强烈的。他们之中只有善于协调利益关系并会做思想工作的人才不致遭到工人的非议。

3. 农民 郊区除很少部分远郊农民因条件不具备而束缚在土地上故而保留原有农民意识外（如有的乡专业户只两家），绝大多数商品意识与转工经商的流动意识较强。但个体、分散意识浓厚，他们宁愿自己做多少得多少，也不愿意将命运交给集体去决定。只有当他们遇到水利设施遭破坏而不得不付出高昂水费时，才谈点集体的好处。

4. 专业户 该市专业户数量不够多，他们的科技意识与商品意识比农民强。他们是农村推广科技的现实基础。

5. 雇工 数量更少，目前还显不出与专业户的矛盾，正象城市个体户的帮工一样，他们待遇不错，意识不到他们与雇主的阶级关系。

6. 城市个体户 政策的最大受益者，财产增殖意识与经营、信息、时间、竞争观念都比较强。有些素质不高的有强烈的投机取巧心理。高消费思想与临时观念是普遍的。

7. 专业知识分子 作为以科技为先导发展生产力的主要力量的这个群体，它的工作基

础是智能与思想，工作过程是信息在头脑中的加工，要求有迅速而准确的信息和充分的工作条件（如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工作中不受干扰等）。成果的社会性与生产的个体性决定着他们的自主意识，他们对自由要求强烈并把它作为精神生产和创造的必要条件。他们要求的平等是机会平等，而不要求结果的平等，他要超越别人才能在精神生产中获胜。对民族前途的忧患意识以及民主、参与意识都比较强。

8. 管理干部 该市干部中的权威意识、代表意识、先进意识、竞争意识都很强烈。在管理系统中，上级对下级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这种权威是以服从观念为基础的。先得服从上级，然后对下级才有权威，因之等级观念也是很强的。他们是提拔中的优胜者，也是这座城市发展的功臣，自然流露着先进的自豪，尤其是政治上先进加上领导建设的成功，感到自己无时不在代表该市人民的利益。该市干部确有股虎虎生气，但市民认为这个群体的公仆意识和公平观念尚嫌不足。

#### 四、利益群体的结构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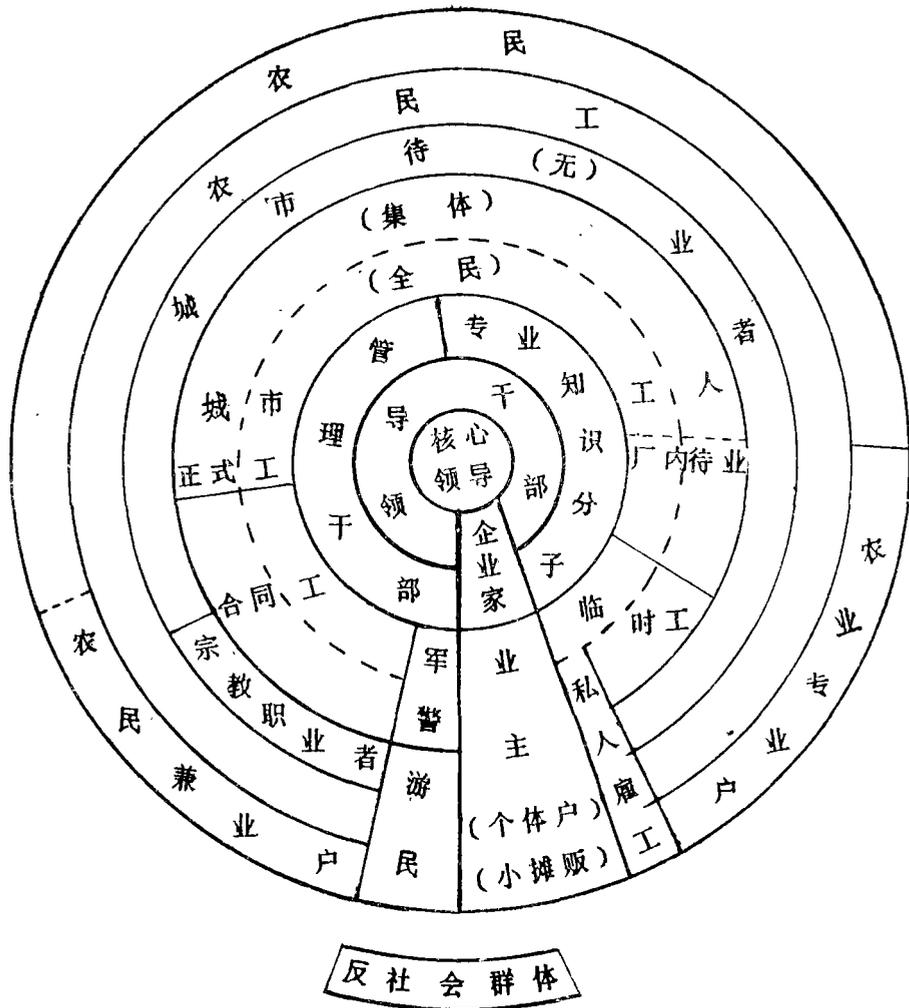
为了更直观地表述该市社会的总体构成，我们用七层同心圆的社会利益群体结构图来示意。在上节所叙述的12个社会利益群体都可以找到它们的位置。这七个圈即表明该市人民在党的市委常委领导下，团结一致地建设该市，充分表现党领导的核心作用，又将各利益群体的相互关系和各种社会差别予以揭示，这包括前面所述的六个方面的社会差别，在一定意义上它就是社会利益圈，在一般的表述中，也可视为社会阶层。它展示着该市整个的利益格局。

处于核心圈的是市级领导干部，其轴心是市委常委；第二圈是县局级领导干部，是各职能部门及部分大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第三圈是科以下管理干部、专业知识分子以及有各自企业级别的企业家；第四圈是城市工人，包括军警在内；第五圈是尚未进入正式工作的城市劳动力；第六圈是来城农民工；第七圈是农民。楔入公有经济圈的是业主、小商贩和极少数私营企业主；楔入城市的是游民，游离于社会之外的是反社会利益群体，与之对应的军警执行着专政的任务。工人群体内部又因所有制不同、用工方式不同而有所区分。（见后图）

本文所说的社会群体，完全不涉及社会各类组织。组织是社会运行的各种纽带，群体则象机器上的部件。整个社区是通过各种社会组织的纽带围绕核心层运转的，因此这张结构图也具有权力模型和管理层次的意义。

根据后面结构图示，可以看出该市社会结构的总体特征是在多种所有制、经营方式、分配方式的多元经济和多种社会差别基础上产生的多元利益主体的政治一体化社会。在经济领域是具有充分活力和多向发展的兼容并蓄；在政治领域，是实行党领导下政府、人大、政协分工合作的一体化的领导体制。尽管受体制上条块分割的影响，一体化常常发生一些障碍，不过社会管理还是有效的。

因此，充分发挥各种组织的作用，上情下达、上情下达，及时反映各利益群体的现状，不断进行各群体利益的协调，对有利于社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群体利益加以维护和支持，对妨碍社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群体的副作用加以遏制并揭露和防止反社会群体的各种破坏，这将是该社区发展着的组织管理的任务。



社会利益群体结构示意图

## 五、结 论

在对这个社区做了一番“麻雀”式的剖析之后，我们可以从具体到抽象得出认识社会利益关系与矛盾的有效途径。以下做一简要论述。

1. 认识社会利益关系，需要选择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能相对独立、具有明显的利益特征的利益主体为分析单位。它既不能太宽泛，又不宜太琐细。太宽泛，空空洞洞、模模糊糊；太琐细，千头万绪、不得要领，都达不到认识社会利益关系的目的。如果我们用阶级为单位，则分析不到工人阶级内部的五个利益不同的群体和农民阶级大量分化形成新的利益群体的事实。而如果除了六种差别而外，还依据劳动分工中其它一些次要的差异如产业、行业的不同，划分更小的层次去分析，便太琐细了。只有明确了在社会结构中大量存在、必不可少、相对独立、自有功能的利益主体才便于分析。本文所使用的就是这样的分析单位。

2. 认识社会利益关系，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客观存在的现实状况出发，从现实利益关系中去概括、抽象新的概念、范畴以准确地解释生活、认识社会，而不能

主观臆断，用不能反映现实生活的概念去圈定生活现实。我们调查的社区，既然已经出现了那些不同利益主体，就需要有个概念去概括它。在社会学的概念体系中，最恰当的词是群体，但又需有别于其他群体，如性别、种族、民族、宗族等群体。冠以社会利益，表示它们是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具有不同利益的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阶级只是阶级社会中的一种以“一个集团能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为主要标志的利益群体。在有阶级之前或在阶级消灭之后，社会利益群体概念始终适用。即使在阶级社会，在各阶级内部仍然有不同利益群体存在，只不过这些利益关系对于阶级这个最大的利益关系居于次要、不显眼的地位而已。因此这个概念也可以用来分析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利益关系。本文所分析的社会利益群体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比较实在地能反映社会利益关系的概念。同时现实社会有反社会群体的存在，就反映着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个范围和国际大范围有阶级存在的情况下，还必须用阶级这个概念去分析社会的利益关系。因此群体概念与阶级概念是并行不悖的，各有其适用范围与对象。现阶段用阶级概念分析确属于阶级利益关系范围的矛盾，用利益群体概念分析更为广泛的利益关系，这样才能把社会利益关系弄清楚，也会为分辨许多理论是非提供认识工具。

3. 认识社会利益关系，不能从单一角度去分析，必须全面地多视角去考察，社会利益群体概念所指的利益是从人的需要本身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前提出发。经济、政治、职业、知识地位不同，就有多方面、多层次的社会需要，有不同的利益要求。人是动物，但还是社会动物，有社会性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要提“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的需要”的道理。当然物质需要和经济利益是基础，我们曾为劳动人民能够生存斗争了几十年，又为他们的温饱奋斗了四十年，如今温饱以后，人民文化与精神方面需要的比重会日渐增加，我们不考虑这些方面的需要，看不到这方面的利益所在，必然赶不上形势的发展，而且文化精神方面的需要得到满足，才能为发展更高生产力创造条件。不可以设想，在劳动者的文化与精神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有很高的生产率。那末，文化与精神需要所表现出来的利益，如工人、农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的要求，法律上人人平等的要求，群体间的义务与权利对等的要求，对社会的公共安全、正常的工作与生活秩序的要求，人与人之间互相友爱、互相尊重的要求，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等等，都应该在认识利益关系时得到体现。否则，只会走上单纯从所有制来分析利益关系的老路上去。

4. 认识社会利益关系，还需把握各种利益关系的层次性。这里便需要把社会利益关系分为根本利益、基本利益、具体利益三个层次。各群体的共同利益关系整个社会安危、民族存亡，各群体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致性方面，如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四化、建设高度物质、精神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等这些是根本利益。社会的基本利益关系，是维持社会体系正常运转的各群体间的利益关系，是利益群体赖以存在和发展所要求的社会条件的利益关系，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关系。这种利益决定着各个利益群体是否能维护其存在和发展。既然社会利益群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不可能人为地去消灭或取消的，就只有在侵犯别的利益群体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下得到相应的社会条件，使之能发挥其群体的社会经济功能，各得其所，各展其长。社会的基本利益关系决定着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例如前述的城乡、工农、体脑、干群、公私、劳资六个方面的关系，就体现着现实社会的基本利益关系。处理这些基本利益关系，只能用法律、政策加以调节，要统筹兼顾，不能以牺牲一方来维护另一方的方法破坏某个群体的存在与发展的基础。社会具体的利益关系，就是某一群体某一方面的利益

关系,表现在社会组织中,这种关系就比较多,且与个人利益有直接关系,例如,企业中承包定额是否合理、多劳是否保证能多得,管理机关是否任人唯贤、优胜劣汰等等。如果具体利益关系不是个别的而是带有普遍性的话,那就会上升为基本利益关系,成为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重要关系。对具体利益关系认识得愈清楚,越能把握调节基本利益关系的尺度。我们比较熟悉的分析利益关系的模式,是国家——集体——个人的纵向服从关系,而较少分析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横向协调关系,其实在许多利益关系中,横向协调利益关系更有助于社会自组织功能的发挥。集中管理体制将许多本来可以通过横向协调的利益关系全部纳入纵向管理体系中,造成整个利益关系甚至很具体的利益关系都要拿到行政管理体系中去解决,结果多做了不少做不了、也不一定做得好的事,造成许多问题久拖不决、愈积愈多的状况。

5. 认识社会利益关系的目的在于认识社会矛盾。认识了矛盾的各个方面,才能在处理矛盾时处于主动的地位,为此,必须深入考察各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地位和总体利益格局、各个利益群体的现状和心态、与相关群体的各种利益关系等等,才能使各群体利益得以协调,形成全社会的合力去干四化。而群体的利益关系是靠法律政策加以协调的,违背各群体共同利益的行为也要靠国家来遏制,而认识社会矛盾正是制定正确政策和正确执行政策的前提。

作者工作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责任编辑:唐军

## 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理论讨论会暨湖北省 社会学学会第四届年会在襄樊市召开

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理论讨论会暨湖北省社会学学会第四届年会1990年2月26—28日在襄樊市召开。出席会议的70余名社会学教学、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者,向大会提交了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57篇。

与会同志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不同的角度就如何实现社会稳定协调发展这个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他们说:政治稳定是前提,经济稳定是基础。如果政治不稳定,就不能摆脱经济困境;如果经济长期陷于困境,政治就稳定不住,社会也安定不了。要促进社会稳定协调发展,在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持国家的稳定,这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在谈到如何保持国家稳定时,与会同志指出,首先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消除党内产生的各种腐败现象,恢复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形象和威望。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脚踏实地,艰苦奋斗,渡过难关。二是要切实加强农业等基础产业,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全面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努力解决通货膨胀、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经济秩序混乱等当前经济工作中的难题。同时,还要大力提高经济效益。

会上还进行了湖北省社会学学会理事会的换届选举。

(罗东山)